

中体西用思想与维新运动

刘长生, 郑征成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流变发展的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得到不断地充实发展。在维新活动中,中体西用思想是维新人士宣传维新理论、拉拢中间势力、反击顽固势力和推动变法深入的理论基础。变法的最终失败并非中体西用理论的失败,而是中国传统局限与历史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戊戌维新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063-04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世界、并融合于世界的过程,虽然这其中不乏社会变迁中的阵痛。而“中体西用”思想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曾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体西用思想的研究已经不断深入,同时争论也相当激烈,特别是关于“中体西用”是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是历史是整体延续发展的过程,故笔者认为研究中体西用思想,应放在当时社会变革的整体背景下,不但研究其缘起、发展、强盛,还应考虑其兴盛后的流变,拙文旨在探讨洋务之后中体西用思想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演变及对时局的影响。

一 维新运动前中体西用思想的流变

“中体西用”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言之,是吸收西学以补中学,这一思想形成定型于洋务运动时期,溯其源头,可追溯到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把西方学术传到中国。当历史进入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刺激着进步人士在新的时局下探索挽救统治危机的方法,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最先睁眼看世界,主张输入西学,学习西方突飞猛进的先进技术。林则徐精心搜集了外国多种战船资料,并据有关资料介绍的西方技术及战略特点加固了广东海防;魏源在《圣武记》中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以夷攻夷”的“师夷”主张,^{[1]p391}而后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等“师夷之长技”的目标仅是“制夷”,即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艺来抗御外辱,而非旨在改革封建专制体制,实质上是纯粹的“西学为用”的思想。虽然这些先驱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一类的论式,但已经基本概括出了类似的内涵。

真正最先较为确切提出“中体西用”框架的是冯桂芬。1861年,他在其著的《校邠庐抗议》的《采

西学议》一篇中言道:“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p28}他的这一思想后来被洋务派思想家和某些维新思想家所接受和发展。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3]p321}后来更说,“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3]p327}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西学篇)》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4]p76}曾国藩也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5]李鸿章则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张之洞强调“泰西各国一切政教皆无足法”,“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6]p10}这些人士多是从体用、本末等方面加以论述,并事必躬亲的实践与洋务运动之中,使得中体西用思想在洋务运动中大放异彩,虽屡屡遭到顽固派的阻挠,但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在物质层面向西方不断靠近,并向社会的前沿大大的迈进了,但是他并没有触动中国的制度层面及文化层面,特别是以“夷夏之防”为核心的、旧的文化意识形态观念并没有被触动,一切还是在旧的框框中进行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李鸿章在晚年多说的那样,他自己是个裱糊匠,洋务的一切,都是在不断的粉刷,见不得风雨,否则就必破烂不堪。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轰轰烈烈了30年的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终于宣告破产,但是中体西用思想却没有萎缩、消亡,而是从内涵到形式都有了新的发展,适应了紧接而来的维新运动。

二 维新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思想的争论与认同

甲午战后,更多的人开始以宽容的态度,接受西学。谈西学不再如以往那样被低毁为“士林败

收稿日期:2007-10-19

作者简介:刘长生(1983-),男,安徽淮南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现代史、文化史。

类”、“名教罪人”，而是“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不以为深耻”。^{[4]45}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是否应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体”进行变革。由于洋务运动没有实现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维新运动不得不把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的任务同时承担起来，后者的目标就是要在承认西学地位的基础之上，构造出一个会通中西的新的文化框架，以取代原来以“夷夏大防”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样才能有力的推动“西学”的根本引进。^[7]其实，一些早期的维新派，早已探讨过体用关系。地主阶级的开明人士郑观应曾谈到：“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等，此其用”，并说“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4]67-42}中国仅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不在制度及文化观念领域学习西方是弃本求末。

于是，维新人士把“伦常名教”层面的变革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一种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要真正被克服、被摒弃，不仅需要社会各阶层的认可，更需要从观念形态上找到突破口和替代者，只有新的观念酝酿成熟并被广泛接收之后，旧的观念才能被取代。那么，用于突破旧的“夷夏大防”的文化观念是什么呢？从当时中国社会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思想状况看，能够为社会所接受的路径不外有二，即是中西会通的观念与西学源于中学的观念。^[8]在此认识下，维新人士便将自己的变革理论披上传统的外衣，更是把其与西学联系起来，推动着中体西用文化观念的发展，并且推动朝廷文化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变。1895年12月，杨崇伊参劾强学会，御史胡孚宸针锋相对上奏《书局有益人才请伤等议以裨时局》一折，他依据“西学源于中学”和“礼失而求诸野”的观点，在朝廷上委婉而公开地批评了传统以“夷夏之防”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形态。次年5月，李端上《请推广学校折》，称“诸学皆徒习西学、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源，一切要书多未肄及”，认为洋务学校普及西学不够，未及西学之要门。后来经光绪皇帝批阅、批准，该折在上海《时务报》刊登，引起较大反响。^[9]这标志着朝廷的文化意识形态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以“夷夏之防”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形态观念已基本被否定。浙江巡抚廖寿丰1897年设立求是书院于杭州，延请西方通达之人为书院的教习，要求学生“每月肄习之暇，泛览经史国朝掌故及中外报纸，务期明体达用”；是年11月，陕甘总督魏光燾建崇实书院，提出准则为

“每日早起讲习中学二时，考求西学又二时”，“以储明体达用之才”。^{[10]3982,4007}这样，在朝廷公开的赞成或默许下，“‘中体西用’则在朝廷的支持下，正式取代了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成为朝廷新的文化意识形态”。^[8]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维新人士试图建构的全新内涵的“中体西用”思想是在曲折中不断得到认同的。康、梁等人倡导的“中体西用”，其内涵上大大超过了洋务派所主张的学习西方的器械、技艺的表层。康有为在1891年创办万木草堂时，把中西会通作为他的办学宗旨，强调“必有之体，而讲西学政义之用，然后收其用也”，实质上突破了传统“体”的范畴，将“宋学义理”，即儒学精髓作为根本。而后，早期维新派郑观应其著《盛世危言》中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4]68}的论述，实质是在为西学谋取合法的地位。甲午战后，各方人士包括维新派知识分子、朝廷及地方的开明官员，如梁启超、孙家鼎、陈宝箴、张元济、盛宣怀、沈寿康等人，都突破了洋务派对“中体西用”的解释。他们认为洋务派的变法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11]45}只向西方学习器械、技艺，尚未学其根本，仅是触其“皮毛之皮毛”而已，若要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之现状，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12]277}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体”进行变革的要求。

在维新人士的推动之下，光绪皇帝也逐步信奉了康、梁等人“中体西用”的文化理论范式。1898年4月22日，光绪发布上谕，要求“将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10]4093}光绪帝在“诏定国是”中说：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的基础上，博采西学，以求治疗中国之积弊。这表明他已经完全赞成与支持维新人士宣传的“中体西用”理论了。^{[10]4094}此后，康有为等人对“诏定国是”上谕中提到的中体西用方针，作了详细的论证，着重体现在宋伯鲁的《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该折写道，“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也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也”。^{[10]4106}该折由光绪皇帝批准后，在上海《时务报》发表。皇帝的公开表态，说明维新人士的中体西用思想经过长期的争论，取得了初步胜利。

三 中体西用思想推动着维新运动的发展

许多学者认为,维新运动时期,顽固守旧势力是借用中体西用这一口号来反对打击维新运动的,实际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一定时期内,维新派就是通过中体西用来与洋务派顽固派的桥梁的,并且运用这一思想,将维新运动的舆论与理论道路铺平的。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他所理解的西学是西政、西艺和西史,即“学校、地理、度支、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仪、电,西艺也”;维新人士所提倡的西学是设议院、君主立宪制等政治体制;是西方学校农工商制度。^{[13]p23/p25}维新派与张之洞所主张“会通”中学与西学,虽有区别,但并非完全冲突;张的“中体西用”论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两重性,在兴西学的某些方面是一致的,这也是之洞早期一直支持维新派的原因之一。学术界论及洋务派阻碍维新运动举措之时,常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论据,称他“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14],仅仅是想择西学以补吾之不足。在《劝学篇》中,确实围绕着中体西用构造了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但它其中“通过对中体西用的论述,既批评了保守派拒绝变革的行为,也批评了维新派的许多激进观念”^[8];其批判的激进观念多指向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主张,并非拒绝一切体制变革,并未全盘否定改革维新,他在为封建旧学张本的同时,也为西学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他认为,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15]

当维新运动不断推进之时,维新人士坚持的“中体西用”文化论式曾起到扩大阵营的作用。梁启超为总理衙门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指出,“中国学人大弊,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也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绝不能合,徒互相垢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16]通过这样的宣传与鼓动,大部人士开始走上维新派精心设计的围墙之内,为其言语。礼部尚书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所拟章程中讲到:“今京师创立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7]p426}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著文:“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政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多方面内容,设立农工商局、铁路矿产总局、邮政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设立学校、译书局,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学会;训练陆海军,陆军改练洋操等等,在当时算得上是“博采西学”。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度,真正变

法之时,康梁等维新人士并未再提,认识到“体”的迅速完全变更是极其困难得,在大力采“西学”的同时,保持了“中体”的表面完整性。可以说坚持“中体西用”思想是推动着光绪帝不断支持维新的和拉拢了部分中间力量靠向维新的基本保证。

整个维新运动期间,颁布及推行改革的各项措施是离不开中体西用的。光绪皇帝多次发布上谕,维新派多次反驳顽固派的非难,都是在中体西用的名义下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定国是诏”中明确指出:“国是不定,则号召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10]p4094}这里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实际就是“中体西用”的另一种表示。事实表明,维新变法要实现的经济上的富国养民、政治上的开明专制和文化上的中体西用三个目标是互相支持协调一致的,而作为文化层面的中体西用在其中具有导向作用。戊戌维新期间,不仅康、梁等人宣传中体西用,张之洞等开明官僚宣传中体西用,全国各地的报纸、学会、新式学堂等也都公开奉中体西用为宗旨。这种文化理论虽然内涵各有不同,但是它毕竟能成为一切积极地关心中国富强命运的人的基本共识,中体西用自然地成为了维新人士推动变法的基本的理论支柱。

变法最后是失败的,但从变法宣传、发动、失败整体过程来看,中体西用思想在完善改革理论,组织变法人才、推进变法措施等方面都曾起到过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的原则是逐渐吸取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因素,摈弃中学中的糟粕的,是适合时代特点的。只是,中国封建社会,保守文化充斥,封建守旧势力盘根错节,变革运动必然会遭到来自封建守旧势力以及传统习惯势力的激烈反抗。另外,在维新人士的对时局做了错误的估计,激进冒险的行动,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领导人物实际权力以及主观好恶等历史偶然因素的作用之下,最终导致变法不得不走向失败。总而言之,维新运动的失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局限和历史的偶然因素所致,并非中体西用理论的错误。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魏源. 圣武记(卷十四) [M]. 道光二十四年古徽堂重刻本.
- [2]冯桂芬. 校分陟抗议[A]. 戊戌变法(一)[C].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3]王韬. 韬园文录外编[M]. 中华书局, 1959.
- [4]郑观应. 盛世危言[M].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5]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M].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 [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M].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1930.
- [7]季云飞. 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J]. 求索, 1991(3).
- [8]郝晏殊. 中体西用: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J]. 河北学刊, 1999年(3).
- [9]阎小波. 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J]. 学术月刊, 1993年(3).
- [10]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M]. 中华书局, 1958.
- [11]康南海自编年谱[A]. 戊戌变法(四)[C].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12]戊戌政变记[A]. 戊戌变法(一)[C].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13]张文襄公全集(卷202)[M]. 北京新华书店, 1990.
- [14]郝锦花. 晚清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J]. 山西大学学报, 2004(1).
- [15]熊吕茂. 近代“中体西用”思想的蕴涵及其演变[J]. 文史博览, 2005(6).
- [16]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A]. 戊戌变法(二)[C].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17]议复开京师大学堂折[A]. 戊戌变法(二)[C].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The Thought of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and The West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LIU Chang-sheng, ZHENG Zheng-cheng

(College of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is one kind of changing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a, which has in modern China society's metabolism,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development. The thought of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is tht theoretical basis which promote Reform theory, Rope intermediate forces, counter stubbornly forces and promote the Reform in-depth. The ultimate failure of The West Reform Movement is not the failure of the theory, but is the result whic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chance factors affect mutually.

Key words: Study western technology;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责任编辑:李 进)